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集体失语的背后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合作应对

王道勇 / 著



Behind Migrant
Workers' Collective Silence
Subject Absence and
Social Cooper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集体失语的背后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合作应对

王道勇 / 著



Behind Migrant
Workers' Collective Silence

Subject Absence and
Social Coopera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集体失语的背后：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合作应对/ 王道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0

(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300-22079-6

I. ①集… II. ①王… III. ①民工—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3858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集体失语的背后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合作应对

王道勇 著

Jiti Shiyu de Beih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7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8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社 会 学 文 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琳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

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注中国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

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目 录

第一章 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

- 2 一、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概况
- 5 二、农民工社会融合面临的新型矛盾
- 12 三、当前中国农民工的浅层市民化

第二章 农民工研究中的主体地位问题

- 14 一、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范式
- 24 二、农民工研究中的主体缺位
- 29 三、农民工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
- 33 四、农民工主体缺位问题分析进路

第三章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形象流变

- 36 一、农民工相关称谓的历史变迁
- 46 二、政府视野中的农民工群体形象
- 55 三、大众传媒视野中的农民工群体形象
- 64 四、主体缺位与农民工形象的适应性塑造

第四章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自主就业

- 71 一、农民工就业能力分析基础
- 75 二、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供给
- 83 三、就业信息服务供给—获得评估
- 89 四、农民工自主就业与主体性被动张扬

第五章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区隔

- 96 一、生活方式与社会区隔

- 99 二、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区隔
- 117 三、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区隔
- 124 四、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区隔
- 132 五、主体缺位下的社会空间统一体

第六章 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群体性愤怒

- 140 一、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
- 152 二、农民工的集群性抗争
- 160 三、农民工的集体行动
- 169 四、主体缺位下的群体心理异常表达

第七章 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运作逻辑

- 173 一、主体缺位与社会形象塑造
- 177 二、主体缺位与经济地位确立
- 179 三、主体缺位与社会阶层闭合
- 181 四、主体缺位与农民工自我认同
- 183 五、主体缺位与社会风险分配格局
- 186 六、主体缺位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格局
- 188 七、农民工主体缺位的深层原因探析

第八章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主体回归

- 191 一、社会合作及其主要类型
- 194 二、存量改革时期社会合作的价值
- 202 三、农民工问题中的社会合作理念
- 206 四、社会合作与农民工的主体回归
- 208 五、社会合作与共融性社会的形成

第九章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共融性社会建设

- 212 一、制度创新中的社会合作理念
- 215 二、基于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
- 220 三、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共融
- 224 四、农民工主体化与社会共融
- 231 五、农民工中产业化与社会共融
- 238 六、迁徙自由与共融性社会的呈现

246 七、小结：让“农民工”一词成为历史

248 参考文献

255 青年农民工就业调查问卷

259 后 记

第一章 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

在当代中国，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大潮而涌现出来的。从总体上讲，当下的中国，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比农民工群体更普通，也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比农民工群体更特殊。“普通”是因为数量庞大，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2014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2.74 亿，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是第三产业的主要从业人员，是随处可见、最为普通的中国人。“特殊”是因为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没有哪个社会群体比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收入、日常生活和未来更不稳定了。实际上，稍加探究就会发现，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性还远不止于此：农民工不同于古代中国的流民，历代中国流民的流动主要是一种维持生存型的被动性流动，而当代中国农民工外出则是一种谋求发展型的主动性流动；农民工也不同于国外的移民，国外的移民是自由式迁移，大多一去不复返，而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都是“候鸟式”的往返性迁移。

那么，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总体状况到底如何？为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农民工数量、流向、结构、就业、收支、居住、社会保障等情况，国家统计局于 2008 年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对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区、市）6.8 万个农村住户和 7 100 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进行监测调查，搜集了许多关于农民工的准确数据，并且每年公布一份权威的农民工定点监测调查报告。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数据和众多学者与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可以对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基本状况进行一些较为准确的扫描，对其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矛盾进行一个前瞻性的分析。

一、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概况

(一) 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概况

从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和增速均史无前例。根据全国人口“三普”、“四普”、“五普”的数据计算,1982年,全国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为657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66%。到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增加到213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9%。2000年,全国的流动人口达到1.44亿。2010年达到2.21亿。从1982年到2010年,在短短的29年的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33倍之多,其规模和增速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其中,农民工数量在1982年时几乎为零,到1990年时已经有数千万之多,90年代一直有“8000万流民”的说法。到2008年,全国农民工约为2.25亿,其中外出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1.4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最近五六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仍在快速上升。2010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数量增加到2.4亿,外出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约为1.53亿。2012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2013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2014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①

农民工流动的“集中化”倾向非常明显。从教育程度看,外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集中,目前外出农民工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初中毕业的人数最多,年轻人的文化程度较高;从流向的区域看,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流向东部地区;从流动目标看,外出农民工的目标很集中,外出务工经商以获取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从从事职业看,外出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就业取向很集中。

最近一些年,外出农民工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呈现“不流动”的态势。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4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5-04-29。

现在,许多外出的农民工已经不再频繁地在家乡和城市之间流动,而是开始呈现“两极化”。一方面,一部分外出农民工不再远程外出打工,而是转向在本地县城和地级市就近务工经商创业;另一方面,大部分外出农民工逐步融入现在的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的常住人口。如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 961万人,其中有705万人是常住的非户籍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四成左右。这700多万人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但是在北京居住时间都在半年以上。特别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是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与流出地之间的联系减少,开始与现居住地的文化逐步融合,这也对国家的农民工政策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二) 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

从1984年10月国务院以通知形式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至今,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已经走过30多年。回顾当代中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史,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农民工群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些归纳和总结。

在经济层面上,农民工是改革成果的主要创造群体。农民工浪潮带来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如果没有农民工浪潮,东部不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中西部也不会获得因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如果没有农民工的流动,城乡之间的差距会比现在更大,因为农民的收入中现在有40%以上是打工所得。同时,农民工浪潮带来的人口大流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现代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就业,他们构成了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就业人群,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很难实现现代化。

在社会层面上,农民工是处于城市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这个社会群体一般是在就业岗位不稳定、工作条件较差、工资待遇很低、社会保障缺乏、升迁机会较少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

利益、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等方面仍然相互隔离，是城市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

在政治层面上，农民工是政治地位日益清晰的新兴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贯彻《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已经出台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政治选举的相关规定，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真正在城市地区享有选举权。同时，国家正在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以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等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和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所有这些做法都使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更加清晰和明确。

在文化层面上，农民工是文化正在艰难转型的过渡群体。针对 19 世纪末期俄国有 300 多万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指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旋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① 借用列宁的这段话，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农民工也正在主动地进行着“传统人—现代人”的艰难转型：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正在现代化，行为方式正在理性化，现代市民意识正在形成，新生代和第三代流动人口正在成为主体力量。但是该群体的生活方式能否适应城市，行为方式能否适应城市，思维理念能否认同城市，都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方面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漫长的，但也是最彻底的，一旦实现文化层面的“去农民化”，那么农民工也就真正完成了自身脱胎换骨的过程。

^① 《列宁全集》，中文 2 版，第 3 卷，53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二、农民工社会融合面临的新型矛盾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还比较满足于能够“进厂又进城”，对融入大中城市还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勇气；而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城市与农民工之间的进退博弈日趋激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设计如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处于急需彻底变革的状态。粗略看来，时至今日，过去 30 多年间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诉求与相关制度变迁滞后之间的矛盾累积下来，已经形成一些新型矛盾，使问题更加难以应对。

（一）福利水平与身份转变的负向变动矛盾

农民工社会融合面临的第一个新型矛盾是，农民工所享受的福利水平与身份转变的难易程度呈现出负相关变动的规律，这种矛盾致使农民工的市民化有其形而无其实，无法公平地获取市民化红利。

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于城市的户籍身份制度变革涉及的利益主体、改革的冲击面和承受力不同，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都在依据自身状况，适时适度地进行改革，农民工的身份转变难易程度也因市民身份所附带的福利水平高低而呈现出一种“梯度递减”的新格局。

1. 全面开放型

这类城市以居住状态来界定城市居民的范围，城市实行全域统一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可以在城乡间自由迁移，并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身份转变与福利水平实现了完全的契合。譬如，至 2012 年，成都市统一城乡户籍，农民工进城三个月就自动拥有成都居民的所有权利，初步实现了教育、医疗、社保、失业救助、住房保障、退役安置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资源的城乡平等配置。

2. 主体融入型

部分大城市虽然没有实现自由迁徙，但对农民工身份转变的限制相对